

哲学史

79 自逻辑实证主义以来的伦理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我觉得这周我的嗓子应该恢复了，所以疼痛感减轻了不少，也希望你们的情况也是如此。上周，我们探讨了日常语言分析如何拓展和打破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僵化的科学经验主义。我们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宗教语言之争中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人们正努力寻找某种经验性的参照物来谈论上帝。

今天上午，或者说今天下午，我想探讨一下伦理学理论，从逻辑实证主义开始。我们首先会看到，日常语言分析同样对打破逻辑实证主义及其情感主义伦理学理论的束缚产生了影响。艾耶尔在他关于伦理学和神学的章节中对此进行了非常有效的阐述，他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道德判断，只有情感表达，甚至连对主观事态的陈述，甚至这些陈述本身，都不能称之为判断。它们仅仅是对心理状态的描述，而非道德判断。

因此，诸如“偷窃是错误的”或“战争是可耻的”之类的说法，仅仅是情绪化的，并没有对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论断。如今，日常语言分析的影响体现在我们称之为元伦理学的辩论中，而“元伦理学”这个术语实际上是与G. E. 摩尔对“善”的探索相关的。你可能记得，摩尔认为我们对“善”有一些直觉上的认知和识别，尽管我们无法将其还原为任何自然属性、幸福、快乐、效用、自然法则，或者任何可以通过经验或形而上学定义的东西——这就是他的自然主义谬误。

当然，艾耶尔对摩尔的直觉主义做出了回应，他认为如果我们无法定义或描述善，那么“善”这个词就毫无意义。因此，情感主义理论正是从这种思考中衍生出来的。但元伦理学关注的是伦理语言的意义。

显而易见，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声称道德术语毫无意义，认知上毫无意义，它指涉的并非任何东西，因此元伦理问题成为了首要关注点。但直觉主义并没有因此消亡。

W. D. 罗斯延续了一种直觉主义，他认为直觉所指的是正确的，而非善，而是正确的本身。你可以用“密尔”和“不能”之间的类比来区分这两个概念。密尔以及任何结果主义或目的论伦理都关注善，关注良好的结果，关注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目标。

然而，权利与行为或动机本身的性质有关，而非与后果有关。在“不能”的情况下，权利总是出于义务而行动。因此，W. D. 罗斯认为我们对权利有一种直觉上的认知。

即使我们无法将其简化为任何其他属性，这个术语的含义也变得清晰明了，这样仍然避免了自然主义谬误。例如，当我们签订合同或做出承诺时，这个术语的含义就显而易见了。这时我们就意识到，我们负有后续义务。

我们履行义务是理所应当的。因此，该术语的含义与因某些关系和合同而产生的普遍认可的义务有关。您可能会注意到，这种现象自那时以来变得越来越普遍，成为了一种契约论的主题。

订立合同后，我们就承担了义务。之后我们会发现，这种义务被普遍化为所有道德义务的基础，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但对罗斯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参照点，用来举例说明我们对权利的直觉认知。

但当你研究到我列举的其他发展时，日常语言分析就显得更为有效了。威廉·弗兰克纳（William Frankner）发展出一种道德视角方法，他曾在密歇根大学任教，并撰写了一本广为流传的入门读物《简明伦理学》（Simply Ethics）。这本书只有大约100到120页，但其使用频率可能超过了其他任何同类书籍，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弗兰克纳出身于基督教改革宗家庭，毕业于加尔文学院。

虽然他的有神论在他的书中没有明确体现，但它确实潜藏其中。这一点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想我之前可能跟你提过——这篇文章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我记得是为了回应G. E. Moore的自然主义谬误。他在文中论证，虽然你不能从“是”推导出“应该”，但如果加上一些额外的前提，例如神学意义上的前提，那么你就可以从“是”推导出“应该”。也就是说，虽然A在逻辑上不蕴含B，但A加B却在逻辑上蕴含B。因此，通过添加一些能够引入道德义务来源或价值基础的前提，你就可以从某些事实前提中推导出某种道德义务。

所以，如果你说前提B，即上帝，一个具有人格和道德的存在，是存在的，那么你就立刻就在这个前提中加入了价值判断。但无论如何，他那篇奠定其哲学声誉的早期论文，我认为，为他后来强调采取道德视角奠定了基础。因为伦理术语的意义取决于你是否采取了道德视角。

也就是说，持有道德观点代表着一种非认知因素，它并非仅仅是情感上的，而是一种非认知的态度，体现在你致力于从道德角度评估事物。因此，有了这种非认知视角，我们就能理解道德术语指的是道德观点中所包含的这类态度。它们具有这种心理参照点。

你可能会说，这导致了一种伦理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中，道德术语的定义与诸如持有某种道德观点之类的主观状态相关。没错，但最终你仍然会做出认知性的道德判断，而这正是A. J. 艾耶尔所不具备的。库尔特·拜耳是这位澳大利亚哲学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更广为人知的是RM Hare的规范主义。RM Hare曾在牛津大学任教，你可能记得我之前在谈到宗教语言辩论时提到过他。他举过一个例子，说当时有位牛津大学的学者对某人的尝试做出了非理性的反应，你可能还记得。

在他的著作《道德语言》中，他试图分析日常用语中道德语言的用法。他得出结论：道德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是一种祈使语气，而非陈述语气。因此，其根本意义并非在于陈述事实，例如“A是B”或类似“偷窃是错误的”之类的说法，而在于祈使语气。

别这么做！道德语言是规定，而非描述。因此，它规避了实证主义对所谓事实描述的验证。道德断言并非事实描述，而是规定，所以二者本质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观过于粗暴地狭隘，以至于只允许同义反复和描述性陈述。其他一切都被视为情感表达。那么，命令之类的又该如何解释呢？即使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难题。我昨晚（确切地说是上周）读过一段文字，维特根斯坦说，有人说，不可。

你想回应的其实是，如果我这么做了呢？维特根斯坦探讨的是，如果你秉持还原论的观点，认为你只能陈述事实或表达情感，那么“不可”这条诫命就显得有些怪异。你会问，这条“不可”究竟是什么？而黑尔实际上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并将其视为道德语言的显著特征，不仅包括道德判断，也包括所有其他类型的道德语言。这就是规范主义。

当然，这种规范主义对其依据的原则含糊其辞。这可能是社会规范，也可能是父母规范。

也可能是其他命令或指示。甚至可能是神的旨意。你会注意到，关于神的旨意，稍后才会提到。

规范主义之后不久，描述主义就出现了。描述主义，比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菲利普·弗特和约翰·塞尔，其本质在于它仅仅关注经验事实，但这些经验事实却带有价值判断。

为了阐明他的观点，约翰·塞尔在一篇题为《如何从“是”推导出“应该”》的文章中，展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所以，现在我先把黑板关掉，这样你们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琼斯说：“我在此承诺支付史密斯5美元。”

这是一个事实陈述，可以通过经验验证。因此，琼斯承诺支付史密斯5美元，这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所以，琼斯也因此承担了支付史密斯5美元的义务，这只是术语定义的问题。

因此，简单来说，琼斯有义务支付史密斯5美元。由此，同样简单来说，琼斯应该支付史密斯5美元。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源于经验可验证的陈述的道德义务。

也就是说，有些事实情况，例如承诺，是一种社会行为，可以用经验术语来描述。有些可描述的情境确实涉及道德上的“应当”。因此，要从“应当”中区分出“是”，就需要仔细描述并相应地翻译描述内容。

所以，你看，So 所做的，是指出他所谓的言语行为，比如，琼斯说：“我在此承诺支付史密斯 5 美元。”这是一种言语行为。这是一种具有道德承诺的言语行为。

语言远比AGA的过度简化要丰富得多。因此，你会得到一种描述主义。现在，在很多方面，最有趣的进展之一就是神命论。

现在，关于神命论的文献——对于那些研究过伦理学的人来说，这早已是老生常谈——往往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对话录《欧绪弗洛篇》。在《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探讨了孝敬父母、敬畏神明等问题，并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神命的正确性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还是因为神命的正确性才赋予它意义？柏拉图就提出了这类问题。总之，将我们的道德义务追溯到上帝的旨意，这由来已久。

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无论它们以何种方式颁布，都具有神圣性。这一点在伦理术语的含义中得到了体现。我特意以这种方式切入，是为了指出神命论至少可以有两到三种不同的应用方式。

它可以被运用，而且我认为这或许是它最有价值的意义所在：它可以用来探讨道德义务的基础。为什么要行善？嗯，遵从神的旨意。神命论。

道德义务的基础显而易见。它也被用来解释我们道德知识的来源。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对的？因为上帝已经说了。

顺便一提，卡尔·亨利在他的伦理学著作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实际上，他并没有区分这些不同的方面，但他主要关注的是道德知识的来源。我认为，如果你认识到道德问题上既有普遍启示也有特殊启示，那么你仍然可以用它来强调道德知识的来源。

当然，在《罗马书》第一章中，保罗明确地谈到了通过普遍启示而获得的道德知识。如果道德律的体现就在于人性的构造和运作方式，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作为创造者就意味着存在着这条神圣的诫命。但是，神圣诫命理论的第三种应用方式，也是在后实证主义语境下尤为重要的应用方式，在于它对道德术语含义的阐释。

判断某件事是对是错意味着什么？判断某件事是好是坏又意味着什么？这都与上帝的诫命有关，与上帝的旨意有关。因此，这种对神命论的复兴正是为了回应艾尔提出的问题。

这一点在罗伯特·亚当斯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顺便一提，你可能听说过，或许你去年在会议上见过玛丽莲·亚当斯，是吗？罗伯特·亚当斯是她的丈夫。

他们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对夫妻搭档。真是令人敬佩的一对。他写过很多关于神命论的文章。

菲利普·奎因就此主题撰写了一本书。他曾就读于布朗大学。和许多其他优秀人士一样，他现在在圣母大学任教。

全世界的人似乎都聚集在巴黎圣母院。菲尔·奎因也在其中。顺便一提，他现在在基督教哲学家协会期刊《信仰与哲学》的编辑。

但目前这两位是主要人物。不过，对神命论的强调也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安斯康姆。你又该记住谁的名字呢？

一位英国天主教女哲学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她就一直在道德哲学和哲学心理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嗯，我想应该是1955年吧。她在英国期刊《心灵》（Mind）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道德哲学》的文章。

现代道德哲学。她在书中抱怨说，似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某种阴谋，旨在将法律概念从现代伦理学中剔除。她尤其指的是功利主义的影响。

当然，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不仅包括功利主义伦理的传播，还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这显然将法律的概念从道德哲学中剔除出去。她的论断是，如果没有某种道德准则，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立法者而言，很难维持道德法则的概念。

因此，她追溯了西方传统中道德律概念的根源，即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和罗马斯多葛主义。正是这种结合。而她，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和托马斯主义者，当然主张重新强调道德律的重要性。

这不仅为义务提供了依据，也为道德律概念的意义提供了依据。道德律概念的意义在于，它只有在存在道德律制定者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她想要的是一种自然法理论，一种结合神命和自然法的理论。神命赋予道德概念以意义，也为权威提供了依据。

而自然法则解释了我们如何认知自身的道德义务。因此，我认为，这一论述实际上将整个伦理理论体系恢复到了实证主义者出现之前的状态。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之前更进一步，因为纯粹的功利主义伦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神命论中。

但也要从道德和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考虑。有什么评论或问题吗？嗯，卡尔。是的，不过卡尔，你再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

除非存在一位道德立法者，否则道德法则的概念就毫无意义。道德法则没有经验参照点，也没有事实参照点。当然，人类可以制定法律，但那样的话，就相当于立法机构或统治者在履行道德立法者的职能。

但那样就缺乏神律的权威。所以她需要神律的颁布者来赋予普遍不变的道德律以意义，否则这个概念在经验上、事实上都将毫无意义。康德会如何回应呢？首先，康德不会关心经验意义、经验可验证性以及所有这些问题。

你会明白的。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康德的观点恰恰相反。康德会说，既然我们对责任感有这种直觉上的认知，我们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解释这种认知。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她是一位道德立法者。你会明白的。所以我猜康德会赞同安斯康姆的这一点，但会否定她基于形而上学基础的自然法理论。

康德和安斯康姆一样，都清楚地认识到道德律与道德律制定者之间的联系。是的。

康德会说，你必须假定存在立法者。我怀疑，安斯康姆（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名托马斯主义者）会说，我们可以运用托马斯关于道德立法者的五个论证。但即便没有立法者，康德也会说我们负有义务。

是的，他会说我们有道德义务感。那种直觉。嗯，是的，我们凭直觉就能认识到道德的共同基础，那就是我们应该始终出于责任感而行动。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很符合直觉。矛盾之处在于，当你试图理性行事却做了错事时。矛盾就体现在具体的道德判断中。

但我认为你可能想表达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这一点。我用“直觉”这个词来形容康德。是的，不是摩尔或罗斯意义上的直觉，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直觉，而是指一种共同的道德核心。

但由于实证主义可验证性标准的出现，安斯康姆想要避免这种方法。因为实证主义者会问康德：这种责任感的地位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这种责任感可以通过经验来验证吗？而实证主义者会回答：不，它不能。

艾耶尔的情感主义理论排除在外了。你明白吗？现在，安斯康姆绕开了这一点，试图重新探究义务或道德律概念的意义。因此，他认为义务或道德律依赖于道德律的制定者。

卡尔？所以，对这些道德法则的认知仅仅是道德法则制定者的产物？这并非直觉，但其实更……是的，是的，是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是彻底的自然主义者，并且没有道德法则制定者，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发现道德法则的任何意义。完全没有事实意义。

现在你看，问问你自己，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问问你自己，根据艾耶尔的可验证性理论，像“我们都受普遍法则的道德约束”这样的陈述究竟意味着什么？明白了吗？那么，受到道德约束意味着什么？是指主观上感到自己必须这样做吗？主观上的内疚感，好吧，艾耶尔会说，那是心理学家去描述的东西，与道德义务无关。明白了吗？所以，如果你仅仅回到心理学的描述，那根本无济于事。还记得艾耶尔的四道德语言吗？记得吗？有心理学描述，还有心理学和其他主观描述。

诚然，有些劝诫只是表达情感，有些则是赤裸裸的情感宣泄，还有一些是所谓的道德评判。此外，我还应该指出，其中也包含一些元伦理方面的论述。

好了，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那场关于道德语言及其含义的辩论的结果，重新引入了规范伦理学。在过去的20年里，规范伦理学领域一直非常活跃。

我列出了五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你应该熟悉他们的名字，如果你学过伦理学理论，那么你肯定已经很熟悉他们了。约翰·罗尔斯在哈佛大学任教，他撰写了关于正义论的著作，引入了契约论方法。你可能还记得约翰·洛克的自然状态概念，由于共同的需求和权利，自然状态催生了依赖于某种社会契约的公民社会。

罗尔斯所做的，不仅仅是在讨论政府的契约论基础，而是讨论一切道德的契约论基础。因此，他需要有他自己版本的“自然状态”。而他所描述的，正是他所谓的“无知之幕”背后所发生的一切。

无知之幕。也就是说，如果一群人采取一种立场，即他们对可能影响自身未来走向（无论好坏）的结果一无所知，那就是无知之幕。

那么，在无知的面纱之下，你会建立什么样的原则来规范我们的生活呢？他认为，他所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原则。第一，社会收益和成本应该公平分配。第二，当存在不公平现象时，最弱势群体更应该获得优势。

让最弱势群体受益。他试图就此提出一种构建此类政治经济体系的方法。这并非完全是功利主义的方法。

虽然他谈到收益与成本均衡时，显然带有结果主义的色彩，但这并非功利主义的方法。他并非简单地主张为最多的人实现利益最大化。

不。这里面确实有康德式的倾向，强调平等而忽略其他因素。这里面确实有康德式的倾向，但这并非出于基本责任感而奉行的康德式伦理。

这是一种契约论安排。因此，道德并非建立在某种神圣诫命之上，也并非建立在某种先验的道德原则之上。

它并非基于对后果的经验评估。好吧。这样一来，你就否定了神命，否定了自然法，否定了康德伦理学，否定了功利主义伦理学。

它更多地建立在社会共识之上。他的方法引发了大量的讨论，不仅在伦理学家之间，而且在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也是如此。

基于这些原则，他的政治经济哲学倾向于自由主义而非保守主义。同样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罗伯特·诺齐克，在其著作《无政府状态、国家与乌托邦》中，展现了极其保守的经济和政治思想。诺齐克认为，一切皆有其基本原则。

每个人都有权获取自己能够获取的一切，只要他不非法掠夺他人的财产。这就是获取权。这是一种伦理上的利己主义。

他奉行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尊重财产获取权。当然，他也提倡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但本质上，这是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

在我看来，他体现了里根经济学的哲学理念，这种理念强调个人主动性，本质上是在尽可能减少法律监管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赋予个人获取财富的权利。有趣的是，哈佛大学同一系里曾同时出现过两位这样的人。几年前，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在哈佛法学院就读，他们当时正在讨论……在同一堂法律课上，两位同学就这两种观点展开了辩论。这时，教室后排传来一个声音，原来是罗尔斯，他打断并纠正了某人的观点。

这时，房间另一边传来另一个声音，原来是诺齐克，他也插话进来，于是，这两位法学院的学生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我猜，他们肯定进行了不少辩论。艾伦·古德沃思，芝加哥大学，几年前刚刚退休。

理性与道德。本质上是一位康德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他代表了康德伦理学方法的复兴。

这通常被称为尊重人格。尊重人格是基本原则。你还记得康德对绝对命令的第二种表述吗？那就是我们应该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尊重他人。艾伦·古德沃斯试图从每个人都渴望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一角度来阐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这种自由，那么如果我的逻辑前后一致而不是自相矛盾，就意味着我也应该尊重他人的自由，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因此，我们有了他所谓的普遍一致性原则。普遍一致性原则，实际上就是康德的普遍性原则。你不希望为了维护自己的目的、目标和权利而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

那将违反普遍一致性原则。因此，他试图以此重建康德伦理。艾伦·多尼根也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后转至加州理工学院，于一年半到两年前去世。

艾伦·多尼根的著作《道德论》也是康德式的。他试图从尊重人格的原则出发，探究如何将其推导出更具体、更成熟的伦理体系。他论证了犹太-基督教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

你或许会感兴趣，他曾在这里跟我说过，虽然他花了多年时间思考和论证，但在书稿付印后，他最终得出结论：如果犹太-基督教伦理是真理，那么其背后的神学很可能也是真理，他应该成为一名基督徒。他为人正直，于是就皈依了基督教。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艾伦·多尼根的著作非常值得一读。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我相信你一定在很多场合都听说过这个名字。这三部作品在这个领域都极具影响力，代表着道德决策和行为研究方法从规则导向转向了其他方向。

从这种以规则为导向的道德决策方法，到一种决策伦理，再到我们所谓的德性伦理，就完全不同了。

强调道德品格，关注人的道德品质，而非个别行为的道德品质。

在《德性之后》一书中，他追溯了伦理学的整个历史，从前苏格拉底时代，甚至更早的荷马时代，一直到后康德时代。他指出，从早期希腊人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再到中世纪，所有人都主要关注德性的培养。而对灵魂成长和发展的关注，则体现在柏拉图的思想中。

在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品格发展的探讨。而真正意义上的品格发展，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才出现了以规则为基础、以决策和行动为核心的伦理观。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过度概括。

当然，像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人，在他们运用自然法伦理学方法时，也关注道德规则，即自然道德律以及圣经律法，以指导道德抉择并产生正确的行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更重要的关注点在于美德本身。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乍听之下似乎自相矛盾，但当托马斯·阿奎那谈论正义战争理论的规则时，他是在爱的德行这一大框架下进行的。爱的德行。因为爱要求正义必须以爱来调和。

因此，正义战争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然而，麦金泰尔所做的，不仅在于追溯这两种伦理传统的演变，还在于考察在规则导向的伦理中，美德之后出现了什么，考察了功利主义的发展及其对美德问题的完全漠视。它只关注行动和政策的最大效用。

他追求的是非道德目的，而非品格发展的道德目的。他的确如此。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些目的都基于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哲学传统，而这些传统是无法通约的。

谈到不可通约性，就意味着你不能用一个事物的标准来评价另一个事物。你不能用一个事物的术语来翻译另一个事物。它们之间无法相互还原。

他在第二卷《谁的正义，哪种理性？》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谁的正义”这一问题清楚地表明，就正义的意义和要求而言，各种传统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而“哪种理性”则强调了不同道德观点所依据的理由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这里涉及不同的理性判断标准。

这个主题在他几年前出版的第三卷《道德探究的三种相互竞争的版本》中再次出现。如果你只能读这三本书中的一本，那就读第三本吧。

这篇文章比其他几篇简洁得多。我觉得其他几篇其实都可以缩短一半的篇幅，同样能有效地表达观点。但麦金泰尔是个典型的苏格兰-爱尔兰混血儿，他热情洋溢地表达自己的语言和兴趣，所以他写的东西总是充满魅力，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历史知识，尤其是那些与苏格兰有关的内容。

我的意思是，你不仅能了解苏格兰历史以及其他方面，还能学到很多东西。他对社会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不仅仅是思想史，而是社会史，这一点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三卷中提到的三种相互竞争的传统，在理性观和伦理基础上显然存在差异。

第一种是亚里士多德传统。当然，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传统进行了更为充分的发展。第二种是18、19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版本。

他引用了19世纪某个版本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其中有一篇关于伦理学的文章，将伦理学视为另一门科学，认为它正在逐步积累越来越多的道德知识，这些知识逐渐被普遍认可，最终形成一门以实证主义推理为基础的普世伦理学。他认为，这种理性主义方法源于18世纪某些作家所奉行的规则导向方法。第三种版本，第三种传统，就是尼采。

当然，这是他对其他人观点的补充。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他加入了尼采关于强者与弱者在权力斗争中的伦理观。你知道，就是尼采的那些理论。

因为在他研究其他东西的同时，后现代主义又复兴了，你看，它现在强调的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正确，但本质上却是主观主义，谈论我的真理、我的道德标准等等，其根源并非理性，而是意志。所以他提出了这三种选择，并试图阐明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请记住，它们对理性的构成有着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传统包含智慧的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智慧与审慎并存。它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并在中世纪再次得到发展。第二种传统则是一种准科学式的演绎推理，因此它是科学主义的理想。

第三种情况，理由纯粹是合理化，是情感的奴仆。从中，你就能感受到他的出发点。

有趣的是，这类事情与他自己的自传密切相关。因为他年轻时，也就是五十年代，就开始撰写关于宗教语言问题的文章。你可能还记得，他对宗教语言讨论的贡献在于，他谈到了宗教语言中特有的陈词滥调，以及宗教语言与其他语言用途截然不同的独特性，因此，你不能仅仅依靠其他任何语言用途来支持宗教信仰。

关键在于，当时他完全信奉巴特式的神学，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某种存在主义的遭遇，独立于理性过程来认识上帝。然而，多年来，他逐渐远离了基督教。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而这三本书则代表了他逐渐回归某种有神论的过程。因此，当他出版《德性之后》时，他虽然是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尚未回归基督教。

这个过程一直在进行，以至于在第三卷中，他不仅是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还是一位托马斯主义者，而且是一位公开的天主教徒，你看。所以他回归了基督教信仰。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像许多其他善良的人一样，他现在在圣母大学。

这就是伦理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五位是伦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我的感觉是，罗尔斯的影响力仍在持续，而且会继续下去，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诺齐克、格维尔特和多尼根。

而就目前而言，在规则和原则导向的伦理决策领域，罗尔斯或许是最受关注的两位作家，也是你应该了解的两位。好了，我就说到这里，留给你们提问、反馈、评论、补充等等。总之，规范伦理学，就像宗教哲学一样，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依然充满活力。

他们如何处理正义与仁慈？就正义而言，是的。你经常会听到人们谈论正义。罗尔斯将正义定义为公平地分配社会收益和成本。

诺齐克在维护个人权利方面，基本上主张的是财产获取权。格维尔特则主张尊重他人及其人生规划。多尼根同样主张个人权利。

所以我认为，可以说对正义的强调是基于权利理论的。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这四位学者都不是功利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略了结果因素；他们并没有。

但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者，并非事事都以功利原则为指导。因此，尊重人格、康德式的观点以及人权理论似乎都占据着核心地位。多尼根（至少目前是多尼根）肯定会认为，圣经伦理比康德式的伦理方法走得更远。

虽然我不确定他是否最终对此感到满意。我记得在道德理论发表几年后，他曾在我们哲学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在讨论环节，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埃德蒙楼东翼，卡尔文学院的里奇·毛就站在那个角落里，向讲台上的多尼根提问，试图一步步引导他阐明基督教伦理将如何影响他的伦理思考。

他逐渐理解了这一切，开始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不得不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在他成为有神论者之前，他从未这样思考过。他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卫理公会家庭长大，但我认为自从研究生时期以来，他很少从有神论的角度思考问题。麦金泰尔在基督教伦理学家中颇具影响力。

他对神学家斯坦利·豪厄瓦斯（Stanley Hauerwas，简称HAUERWAS）影响颇深。豪厄瓦斯从更偏重神学的角度发展了德性伦理，并将其与伦理叙事方法——即传统的叙事——相结合。这种影响隐含在他对不同传统的强调之中。因此，参与到某种传统的生活、某个社群的生活中，并将它的故事融入自身，是内化该传统价值观并开始践行该传统美德的一种途径。

因此，整个道德发展理论都受到了这种方法的深刻影响。麦金泰尔会说你如何批判某一特定传统的优点呢？是的，这就是弱点所在。你试图保持前后一致。

你会试图考察对他人的影响和最终结果。但他似乎没有形成任何清晰的批判性参照点。所以，这就变成了权衡……我本来想说的是，权衡这件事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问题。

在《论美德》中，你会发现他首先着手做的就是对比荷马传统中的贵族伦理和后来发展成苏格拉底伦理的理念。你会发现，后者关注的是美、力量和荣誉。这就是贵族伦理。如果你熟悉荷马的作品，就能在他的英雄人物身上看到这一点。

苏格拉底则截然不同。他关注的是正义和友谊。

带着敬意。带着敬畏，你看。现在，他……我会说两者都错了吗？错了。

确实不如其他文化。他似乎并没有说它不好。他似乎指的是它所构建的社会类型不如其他文化。

一个建造了斯巴达，另一个建造了雅典。你自己选吧。

是的，没错，完全正确。你说的太对了。

事实上，“人类繁荣”一词经常被用来指代最终目标。人类繁荣。那么，繁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它意味着充分实现自身潜能。

充分绽放。蓬勃发展。人类潜能的充分展现。

但这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好吧，我们已经跑题了。